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商业文明

项松林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 安徽合肥, 230022)

摘要: 市民社会从其与政治社会的浑然一体中挣脱与独立出来, 离不开工商业与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社会经济生活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中, 也需要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形。对于这两者互为表里的相互关系, 休谟、斯密、弗格森、詹姆斯·斯图亚特等苏格兰启蒙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 从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私利与公益、财富与德性等层面作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 深刻阐发了以商业与市场为载体与空间的市民社会之独立性与自组织性, 并从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讴歌了商业文明。而这些论述, 对正在进行社会变革中的我国, 有着重要的表示意义。

关键词: 市民社会; 苏格兰启蒙运动; 自由; 秩序; 财富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4-0068-05

在时下的学术话语中, 有关市民社会的研讨往往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界分的视角论及政府权力的边界与公民权利的保障。诚然, 这是一极为重要且富有理论活力的维度。然而, 我们又不能视其为唯一视角, 尤其是不能忽视市民社会的经济之维的基础性地位。在这方面, 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 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有过很多卓越的论述。重温这些论述, 对积极发展市场经济, 着力培育市民社会, 推进社会的转型的当下中国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再启蒙。

在《国富论》中, 斯密明确将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并指出其核心目标是“富国裕民”。^{1} 其个中主要缘由, 正如日本学者永井义雄所指出的, 民众的启蒙已非时代的课题, 因为民众已经比执政者更了解自己的利害关系, 实际上可以说启蒙一词的适用对象就是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因为他们的政策业已落后于时代。^{[2](45)} 具体地说, 对“政治家”或“立法家”进行思想启蒙, 一方面要向他们灌输工商业与市场根植于自由

的财富理念, 破除干涉主义的迷信; 另一方面要向他们申辩在自由的经济体制下, 市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完全可以做到自我独立与自我组织, 破除自由与秩序水火不容的成见。而这两个方面归根结底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或者说在政府权力的边界与职能问题上, 苏格兰启蒙学者旗帜鲜明, 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人为地干预与管制。从他们对重商主义乃至重农主义的批判中, 我们能清晰地窥视到这样几点理由:

首先, 理性不及。斯密说得很透彻, 政府没有担当“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能力, “要履行这种义务, 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 要行之得当, 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2](252)} 弗格森曾以人口的增长为例, 对热衷于干预主义者进行了很尖锐的挖苦, “在人类生活更富足的地方, 政治家自以为是地通过奖赏婚姻, 诱惑外国人前来居住, 并把本国人在本土, 使人口得到了增长。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里的苍蝇, 为能转动轮子, 推动马车而沾沾自喜”。^{[3](157)} 因为, 在斯密、弗格森等人看来, 干涉主义实质上一种理性的狂热, 是哈耶克所言及的理性建构主义。

其次, 每个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苏格兰启蒙学者基本上都认同斯密这一看法, “每个人

收稿日期: 2011-03-13; 修回日期: 2011-06-19

基金项目: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陆启蒙运动比较研究”(20090211)

作者简介: 项松林(1978-), 男, 安徽太湖县人,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政治思想史。

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4](101-102)}基于这一洞见，斯密在批判国家的限制或奖励政策时反复强调，“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1](27)}弗格森也是这一理念的坚定信奉者，“重视自由的民族会自觉地寻求一种环境，这一环境使他们得以按自然习性行事，且效果较之国家事务委员会所规划的环境更显著”，“私利较之国家的精心安排更能保护商业和繁荣”。^{[3](159-160)}这种立场，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从这种信念出发对政府的权力边界进行了严格界定，反对政府干涉：“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种是，“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般看来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的课题上获得熟练的知识”。“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5](130-131)}

最后，对统治者之警惕与不信任也是苏格兰启蒙学者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涉的重要原因。休谟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必须把每一个政治家设想为“无赖”。斯密尽管经常夸赞祖国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但对英国政府的评价也很低，“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6](318)}“象英格兰这样的政府，不论其优点如何，从未曾以善于理财著名。它的行动，在平时一般总是流入君主国自然难免的来自怠懒和疏忽的浪费，在战时又常常流于一切民主国易犯的无打算的浪费。把这种事业让它来经营管理，它是否胜任愉快，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1](377)}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破除形形色色的干涉主义流毒，还需从正面揭示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尤其是要有力地揭示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充分佐证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里，这一群体主要诉求于分工、交换、价格、自由竞

争、无意识之后果，诚然，最形象、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弗格森对市场秩序之自生自发极为强调，尽管他没有撰写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名单里也鲜有提及；但是，他通过商业社会中的分工深刻揭示了社会秩序是“无意识之后果”：“每一种艺术都要求人们全神贯注，……渐渐地，艺术国家的成员除了本行以外，对人类事务一无所知。并且他们无须关注国家利益就能为保存和扩大各自的国家作出贡献。”弗格森还进一步指出，与商业活动相类似，在军事与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无意识地协同发展的。他这样写道，“分工在制造下层分支中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可以和决策及战略的高级部门类似的做法所取得的成效相媲美。除了服兵役外，士兵没有其它任何顾虑。政治家分担了文职政府中的事务。任何部门中的公仆尽管对处理国家事务并不熟练，但他们只要能遵守已建立在他人经验之上的形式，就能获得成功。他们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不约而同的为一个目的而运作。虽然和生意人一样对总体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和他一道，一起为国家提供资源、管理方式和力量”。^{[3](200)}

众所周知，斯密是试图以经济的逻辑、以“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解决下述政治或者立法难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公益如何可能？社会调节与运行机制为何？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主要是基于人之利己心与同情心说明了私利之间的情感调节。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基于改善自己的境况的愿望或者说动机与他人进行经济往来的。因而，在经济交往中，“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6](13-14)}这样的交换法则，在斯密看来，“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7](13)}是完全正当的，不仅不悖于公序良俗，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公益，尽管是不自觉的。斯密论证道，“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1](112)}“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25)}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张市场之自我调节机制，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倡导放任主义。苏格兰启蒙学者不是

自由放任主义者,他们不仅赋予政府在国防、司法等职能外,而且都强调无论是市场之自我调节机制还是个人之改善自我境况的努力,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严正的司法制度。在斯密的著作中,这样的限定条件说的很明确,“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6](318)}“大不列颠的法律给予每个人以保障,使其能够享有自己劳动的成果;仅就这一点本身就足以使任何国家繁荣……可以说,这一保障乃是经由光荣革命而得到完善的”。^{[7](42-43)}休谟也同样认为,“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8](5)}故而可以认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所心仪的是一种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与监督的“有限政府”,弗格森这一句话表露了这一群体的共同心声,“如果需要保护,就一定得保护;如果出现犯罪或招摇撞骗,就一定得予以制止;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这些”。^{[3](160)}

二

苏格兰启蒙学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深刻阐发了以商业与市场为载体或空间的市民社会是可能与可行的,还从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讴歌商业文明,展现了市民社会美好的政治经济愿景。

(一) 生活的“奢侈”

“技艺和专业分工后,财富的源泉大开”,^{[4](200)}养家糊口的生存经济时代开始远去,追求精致而舒适的“奢侈”生活日益成为市民社会之新风景。因而,对精致而舒适的“奢侈”生活进行辩护,是启蒙学者的重大使命,也关涉着服务于商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力量,“政治经济学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奢侈的道德分析,是对于不能再从生存需要来考虑人的期待的确认”。^{[9](739)}

首先需要辨析一下,18世纪的启蒙学者所言及的奢侈的真实含义。正如后来弗格森所总结的,“尽管我们各抒己见,但是我们在用该术语(指奢侈—引者)来指人类为了过上舒适、便利的生活而设计的复杂器具方面大体是一致的”。^{[4](259)}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奢侈”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概念,即与人们在前商业社

会满足于“生活必需品”相对照,是指人们对生活舒适品或便利品的追逐,其所指称的社会内容主要就是“技艺的日新月异”。比如,休谟于1752年发表的论文《论奢侈》(of Luxury)到1760年再刊时,就改名为“技艺的日新月异”。^{[10](297)}

对奢侈的辩护方面,曼德维尔是先行者,“《蜜蜂的寓言》对奢侈行为的讨论被视为这方面最出色的文献之一,其辩护力超过之前的所有文献。有评论者把曼德维尔视为第一个从经济理论的立场为奢侈行为进行辩护者”。^{[11](95)}扼要地说,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不仅在宽泛的层面将奢侈与自利、骄傲、虚荣等一并视为人之行动的主要动机,从而贯穿全书;而且专门写就了一条评论(第“L”条),从细微的语义学角度进行诠释与辩护。在曼德维尔看来,奢侈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源于用以界定它的“必需品”“生存需要”以及与其相对的“舒适”“便利”等词汇含义“宽泛”“模糊”。^{[11](84-85)}

在对奢侈的辩护中,休谟最为深刻之处在于以比较的视野将商业社会的“奢侈”与古代社会尤其是斯巴达的“节俭”“节欲”等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对比。在休谟的论辩中,这样几层意思值得关注:第一,古代的政策只考虑统治者的利益或者美其名曰国家的利益,而“全然不顾为臣民造福”。^{[8](6)}对此,休谟的评判是,“那种导致国富民穷的政策乃是暴政”。^{[8](10)}第二,“古代的政策过于暴戾,不太合乎天理人情,有违事物发展的正常过程”。^{8}对此,休谟的建议是,“如果某一社会赖以维系的那一套原则愈是不太合乎自然规律,立法者想要确立完善这套原则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愈大。在这种情势下,立法者最妥善的做法是:俯顺人心之所向,因势利导”。^{[8](9)}“有必要用其他的爱好来影响人们,以利禄在于勤勉、技艺即是享受的精神来激励他们”。^{[8](12)}第三,休谟断然否认了奢侈必然引起腐败的论点,“在生活上讲究享受和舒适,本身并不带有引起贪污腐化的必然趋势”。和曼德维尔一样,休谟也认为将古罗马的衰败与灭亡“归咎于享受和艺术,完全是找错了原因”。^{[8](24)}他甚至认为,技艺最差劲的地方,贪污纳贿、腐化堕落之风可能最盛,如当时的波兰;技艺越发达,国家越繁荣,如当时的很多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目前的版图和两百年前几乎一样,可是这些国家的繁华景象却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归于百工的技艺日进”。^{[8](21)}第四,休谟也否认了奢侈会导致民众身心的孱弱与尚武精神的丢失。“我们也毋需担心:人们抛弃了凶猛残忍的性格之后,会失去勇敢尚武精神,或者不能那么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地保卫祖国、捍

卫自由。技艺不会产生这种削弱身心的影响，相反，作为技艺的不可分离的伴当——勤劳，只会给身心增添新的力量”。^{[8](22)}

（二）政治自由与人格独立

在政治层面上，为什么“农村居民一向处在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对其上司的依附状态中。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人身和自由”？^{[6](371)}对这一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做了明确的解答，即从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对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人格属性等方面的影响来探究。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极力推崇的，休谟是率先“注意此点的作家”。在休谟看来，主要是因为商业、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生态。休谟这样详细地写道：“在那些轻视百工技艺的未开化国度里，全部劳动都用在耕作方面；整个社会划分为两个等级——土地所有者及其奴隶或佃户。后者必然寄人篱下……只有讲究享受哺育了商业和工业，农民耕种得法，就会富裕和独立起来；与此同时，手艺人商人都挣了一笔财产，赢得了第二流人物的势力和声望。这第二流人物正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他们既不肯象农民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隶制统治的淫威；也不希望象贵族那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既然如此，当然也不打算象贵族那样，拜倒在君主脚下，匍匐称臣。他们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君主以及贵族暴政的侵犯。”^{[8](25-26)}

沿着休谟的路径，斯密详细分析了商业、制造业所催生的中产市民阶级在人格属性上的独特之处。正如 Fleischacker 所指出的，“对于斯密而言，‘独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对‘独立’的关注是斯密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的动力”。^{[12](151)}斯密与之后的马克思一样，将人的生存境况与人格特性，即是“依附”还是“独立”看做是界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维度，尽管他没有形成马克思晚年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那样系统的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人的依赖性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中世纪的封建地主与农民、教会和芸芸众生的关系在斯密笔下是典型的依附与奴役关系，而打破这种异己力量正是商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催生的独立而能自立的市民阶级。对于它们的价值，在《法学演讲》中，斯密在比较伦敦和巴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治安问题时做了

著名的论述：“防止犯罪，关键不在于设置警察，而在于尽量减少仰食于人的数量。使人陷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反之，独立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13](173)}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詹姆士·斯图亚特指出，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种不同于“家长和儿童”、“主人与奴隶”、“封建主和佃户”的新型关系，即“工人和老板”的自由雇佣关系，这同时意味着过去那些关系所规约的经济依存方式，如“为了他的全部生存而依存另一个人”、“为维持其个人生命而依存另一个人”、“为了拥有争取生存资料而依存另一个人”不复存在了，人们转而“依靠出售其自身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政府形式从以往的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制过渡到自由民主制政府也就势之必然了。^[14]

（三）商业精神

在苏格兰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商业不仅能带来物质技艺的精良、生活的舒适、政治生态的优化，而且还能敦风化俗。休谟将商人称为“最为有用的人”，^{[8](45)}而在这种“最为用的人”身上，休谟看到了勤勉与节俭及其发散与扩大作用。他这样动情地写道，“商业业能促进勤劳，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个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使人人不当无用废物与草木同腐。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长来求利；这种技艺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转移奢侈逸乐的癖好。一切勤劳的行业使人节俭，同时也使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这一点是置之四海而皆正的”。^{[8](46)}

在《法学讲义》中，斯密专门谈及了“商业对于人民习俗的影响”；在《国富论》中，也多处提及商人的好习惯。在斯密看来，商业不仅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13](260)}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7](371)}而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具有道德强制的功能：商人本来最怕失信用，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约履行所承担的义务，他绝对不能从欺骗附近的人而得到大好处，他的奸诈面目一旦被看出，失败便无可避免。坎南还引用坦普尔的话补注曰：“商人依赖诚实公道，不下于战争依赖纪律，缺乏诚实风气，商业就要完蛋，大商家就会沦为小贩。”^{[13](260)}因而，在商业社会里，谋利式的“市民”对自身的利害关系愈加敏感，则必会勤勉、节约、诚实、小心谨慎。对此，克罗波西解读为，“人对横死的恐惧，给人对自身境况的渴求取代了；这样斯密达成了对霍布斯体系的自由化与商业化”，“在商业体制中，竞争是直接取代美德的因素”。^{[15](99)}

在《市民社会史论》中，尽管弗格森对“商人”社

会颇有异议,但在对比古今商人中,他对现代社会中商业习性还是给予了肯定。他写道,“蒙昧时代的商人目光短浅,招摇撞骗,惟利是图。但是,当他的商业艺术取得了进步,达到了高级阶段时,他的视野就开阔了,他的信条也就确立了。他变得守时,开明,守信,富有进取精神。当大家都堕落腐化时,除了强行保护自己的财产外,唯独他拥有各种美德。他除了需要国家保护之外,对国家别无他求。而且往往他自己就是最聪明、最值得尊敬的国民”。^{[3](159)}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 [2] 李非.富与德: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 [3]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 [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7]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 II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8] 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9] 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10] Hume. Political Essay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1] 曼德维尔.蜜蜂德寓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2] Samuel Fleischacker. 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 judgment and freedom in Kant and Adam Smith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坎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14]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 [M]. A. Skin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 [15] 约瑟夫·克罗波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Dimension of ancient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XIANG Songlin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 Anhui Institu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Industr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rket, civil society is free and independent from political society. Mean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also needs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s for this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cholars like Hume, Smith, Ferguson, James Steuart, made an effective thinking and enlightenment by discuss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reedom and order, private and public welfare, wealth and virtue. They deedly illustrated independence and the self-organizing of civil society, and positively praise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 mater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side. All this heralded the good economical vision of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freedom; order; wealth

[编辑: 颜关明]